

经济学观察

何帆 著

出门 散步的 ● 经济学

天津人民出版社

CPUMENSANBUDEJINGJIXUE
CPUMENSANBUDEJINGJIXUE
CPUMENSANBUDEJINGJIXUE

出门散步的经济学

何帆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门散步的经济学 / 何帆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经济学观察)

ISBN 7-201-03976-8

I. 出… II. 何… III. 经济学-随笔-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7950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赵明东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 300020)

邮购部电话: 27314360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5 印张

字数: 140 千字 印数: 1-4,000

定价: 12.80 元

自序

拜伦说“我写的东西都付之流水,任它浮沉。”少年时代读书至此,不禁为之心折。十多年后,当我为了出自己的第一本随笔集而翻箱倒篋地搜寻旧作,并在电脑前拼贴编校,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忽然又想到了拜伦的诗句。这本集子收录了我从1994年至今所写的二十多篇文章。在八年的时间内仅仅写了二十多篇文章,可以想见我的懒惰和钝。而且,老实说,我写的这些东西大致是沉的多,浮的少,无非是自娱和让朋友们看看。承蒙天津人民出版社错爱,允许我将这些小文结集出版。这给了我一次机会将写的东西捞起来,再一次付之流水,任它浮沉。

对于我自己来说,能够出这样一本书,也是对那些逝去的日子最好的怀念。在这八年的时间里,我主要是在研究生院里读书。从硕士到博士,从北京到波士顿,始终陪伴我的是那种恬淡闲适、从容不迫的心情。等到工作之后才发现,这样的生活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书的时候,我总是习惯在晚饭之后出门散步,最喜欢去的地方是附近丽都饭店的小公园。浓浓的暮色,弯弯的小径,非常适宜于思想的生长,无论是自己独行,还是和同学们结伴,总能有所收获。读博士期间,我曾负笈哈佛,做了两年的访问学生。当时我住的附近

有一个湖,叫 Fresh Pond,我称之为“新鲜湖”。这个湖是 Cambridge 和附近几个小镇饮水的供应源之一。整个湖水都用铁丝网保护起来,只留出绕湖一周的小路,供人们散步和遛狗。我常常到这里散步,绕湖一周大约需要 40 分钟。有一回,当我走到一半的时候下起了雨,没有任何捷径,我只好故作潇洒地走完全程,回到住所全身都显透了。

散步的时候,我想着经济学。最初使我萌发浓厚兴趣的是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具非常简单,而它所讨论的问题博大精深。在我看来,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分析工具无非是经济人假设和成本收益分析。所谓经济人假设,就是说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收益最大化。这里首先隐含着方法论个人主义,也就是说,对于社会现象的解释必须从对微观的个体行为的考察开始。从研究范式上讲,经济人假设确立了约束条件下最大化的分析框架。“人是生而自由的”,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目标,这个目标可以是追求更多的金钱、更高的学位,也可以是做更多的公益工作,每个人都希望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无注而不在枷锁之中”,所以人们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必须受到约束条件的限制。如果说这个约束条件仅仅包括资源、技术和市场条件,那么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消费者理论、厂商理论等;如果说这个约束条件中还包括其他人的战略反应,那么这就是博弈论所要考察的领域;如果说这个约束条件中还包括人们的认知能力、规则、社会习俗,甚至历史因素,那么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所要研究的现象。所谓成本收益分析,是说大多数新制度经济学家相信“天下没有免费的早餐”,人们为了获得一定的收益,就必须付出相应的成本。这个简单的思想在分析社会现象时非常具有说服力。如果你觉得有的人

平白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收益,那注注是因为你没有发现他们还承担着隐藏的成本。如果你觉得有的人浪费着巨大的成本在做“赔本生意”,那注注是因为你没有察觉他们所追求的隐藏的收益。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充满了这样的追问,在这种步步紧逼的追问中,新制度经济学家拓展了人们对成本和收益概念的认识,引入了交易成本、外部性等重要概念。这也正是我喜欢的思考方式。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设想过当我有朝一日给学生们讲授经济学时,如何开始第一堂课。在我的设想中,我们应该是在一片撒满阳光的草地上席地而坐,而我就从经济人假设开始不断发问:你是否认为人是自私的?你是否又认为自私的人是理性的?利他主义者是理性的吗?理性人为什么还会犯错误?人们的自利行为是否会带来社会收益的提高?如果你认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道德和法律?——后来,当我确实有了做这样的尝试的机会,我发现事情和我想像的完全不一样:我提出的所有的问题最后都得自己回答,而学生们在下面沙沙地做笔记。

我学习经济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从阅读经济学大师们的著作开始。熟悉经济学现状的人们会知道,这是一种很冒险、很非主流的学习方式。主流的经济学教育是从学习初级微观、宏观经济学开始,然后学习中级微观、宏观经济学和高级微观、宏观经济学,随着你在经济学山峰攀登得越来越高,你所需要的工具越来越精巧复杂,而现实感也越来越稀薄。对经济思想史有深厚造诣的斯蒂格勒教授就曾经自嘲地说,经济思想史就是不学也及关系的那部分经济学。但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中国经济学界,最有功底的经济学家却大多是从学习经济思想史起家的,或是对经济思想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在这些经济

学家的教诲和影响下,我从阅读原典开始经济学的学习,也是很自然的。到我读硕士的后期和博士阶段,才开始系统地接受经济学的训练,做习题、读论文。根据我的个人经验,我可以告诉比我更年轻的学生们,有两种经济学:一种是在书桌上伏案苦读的经济学,还有一种是更适宜于在出门散步时思考的经济学。如果你的目标只是拿到经济学学位,甚至说如果你的目标是当一个合格的乃至成功的经济学家,你所需要的只是前一种经济学。而如果你想体验经济学的思想魅力,那么我建议你也学学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不过,我必须警告你们:仅仅学习新制度经济学并不能保证你成为一名同行公认的成功的经济学家。这正如你在选择爱情和婚姻的时候,如果你想要寻找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我建议你自己去找就是了,但如果你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稳定和谐的家庭,那么我的建议是最好考虑门当户对的对象,多听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做好婚前体检,必要的时候还要有婚前财产公证。自由恋爱并不能保证婚姻的美满,仅仅有对经济学的热爱也不能保证你成为合格的经济学家。

我相信爱情和婚姻能够完美地结合,我也相信新制度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能够很好地融合。但我对新制度经济学目前在中国的现状有一种深深的危机感。由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非常简单直观,所以有许多人在没有真正领会其精髓的情况下就随意地使用;由于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这些“偶然的”(accidental——借用克鲁格曼的术语)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可以对任何一个经济问题发表意见。从四面八方凑过来的人越来越多,表面的热闹掩盖的却是思想的贫乏和理论的危机。我都不敢讨论新制度经济学了。这真是“大多数虔信者使我们虔诚感到厌倦”。从目前的趋势看,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有两

种出路:一是正式化,就是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把新制度经济学里的思想做成“正式的”数理模型。我在哈佛读书的时候,曾经听过一门叫“政治经济分析”的课,在我们的阅读单子(reading list)中,就有很多诸如 Tirole, Grossman, Helpman, Alesina 等实力派经济学家的最新论文和著作,也有像 Shepsle, Weingast 等精通数理分析的政治学家的作品。二是应用化,即原先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者”在他们“入侵”的领地扎根下来,虚心地向原住民学习,在科学的新边疆建立一个新兴的城镇。在这些新兴的交叉学科的形成过程中,新制度经济学家既能发挥其方法论的优势,又能充分地贯彻专业化和分工合作的原则。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这样的一门新兴学科。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似乎天生地与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契合,所以我相信,国际政治经济学很可能逐渐包容其他的分析方法并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论基石。

毕业之后,我留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一边在编辑《世界经济》杂志,一边在从事国际经济学尤其是国际金融的研究。《世界经济》是一份越来越主流化、越来越与国际规范接轨的学术期刊,我所要研究的国际金融其实就是主流经济学中的一部分即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学。由于工作的需要,现在我主要接触的是第一类经济学,而与新制度经济学亲近的时间逐渐减少了。但是新制度经济学仍然是我的初恋。最近,我和张宇燕教授一直在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我的愿望就是想这份恋情继续保留下去。我希望在我的繁忙工作之余,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出门散步,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出门散步的经济学。

在这本书将要出版的时候,我想感谢所有帮助本书问世的

人们。我最先想到的是我的硕士导师张宇彝教授。他是中国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张老师的睿智、机敏和道德感令我深为折服。读硕士的时候,最让我快乐的事情之一便是和张老师讨论经济学。在内心深处,我一直将我们师生间的默契视为一种缘分。感谢我的博士导师袁元伦教授,他为我创造了宽松的学习环境并不断地鼓励我追求学术的进步。他平实而严谨的学风是对我最好的教诲。感谢我的博士后指导老师余永定教授。从我读硕士起,余教授便是我学习宏观经济学的老师,多年来我一直在他的身边接受他的言传身教。余老师不仅教育了我如何成为一名“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trained economist),而且他的胸襟和人格在潜移默化中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感谢给予我第一份工作的《国际经济评论》副主编邵滨鸿女士,以及我在那里任兼职编辑时的同事冯晓明女士和李明东女士。回首这段经历,我找到了我的工作、研究和写作的“路径依赖性”。感谢我在《世界经济》编辑部的同事张宝珍女士、李元王女士、宋志刚先生和彭月霞女士,他们的辛勤工作分担了许多本来应该由我承担的责任,这才使我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读书写作。感谢梁晓燕、邢小群、詹小洪等各位编辑,没有他们的信任和督促,我可能连这样一本薄薄的小书也拼凑不出来。感谢我在研究生院和哈佛读书时的老师和朋友们,尽管我无法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我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和我分享钻研经济学的乐趣。感谢天津人民出版社和本书的责任编辑,他们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感谢我的亲人们,他们时刻关心着我的成长。最后,我想将这本书献给我的妻子李岩,献给我们共同经历过的快乐和痛苦的时光。

建国五十二年国庆前夕于郎家园



作者简介

何帆，1971年出生于河南省荥阳县，1996和2000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8年至200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2000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工作。现任《世界经济》编辑部主任、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经济学、公共财政、新制度经济学。主要著作包括：《为市场经济联系：当代中国财政问题报告》、《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对外政策：寻找新的理论视角》。此外，曾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3/07

目 录

(1)	自序
(1)	跟老子学经济学
(7)	经济转型与道德重建
(13)	关于寻租的小故事
(18)	禁毒:寻找第三条道路
(29)	在国有企业的内部培育市场
(39)	市场经济的起源 ——读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
(49)	不属于菲利普斯的菲利普斯曲线
(55)	另一个时代,另一本《经济学》 ——读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
(65)	未来世纪的赛局 ——读莱斯特·瑟罗的《资本主义的未来》
(74)	财政压力决定改革路径
(78)	在国际政治理论殿堂里点亮经济学的烛光 ——读刘靖华《霸权的兴衰》有感
(86)	经济全球化的三次浪潮

-
- | | |
|-------|---|
| (93) | 饥饿、不平等与社会福利
——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的学
术思想评述 |
| (105) | 开放政策能带来经济增长吗
——读诺迪克新著《新全球经济与发展中
国家：让开放政策生效》 |
| (119) | 国际贸易对国内政治结盟的影响
——读罗高斯基的《商业与结盟》 |
| (132) | 全球化中的政治三难选择 |
| (147) | 政府的质量 |
| (161) | 危机之后的亚洲货币合作 |
| (172) | 19 世纪的经济全球化
——读威廉姆森和欧洛克的《全球化与历史》 |
| (175) | 开会的收益 |
| (178) | 经济学家是怎样炼成的 |
| (186) | 经济学的风格 经济系的性格 |

跟老子学经济学

我刚读研究生的时候，导师曾给我开了一个必读书目。里面除了哈耶克、布坎南、诺斯、斯蒂格勒这些诺贝尔级经济学大师们的著作之外，还有一本书很特别，那就是老子的《道德经》。后来，我终于抽时间把这本我小时候就耳熟的书读了一遍。结果，我发现我见识过的那些现代经济学观点，有不少与《道德经》里的思想颇为契合。更让我欣慰的是，有些我从学习经济学以来就一直萦绕脑海的困惑，竟也在这古老哲学的启示下恍然大悟。

让我先从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这个话题说起。经济学里的这个主题和文学中的爱情主题一样，有着永恒的魅力。不难看出，老子哲学的基本格调是倾向于自由放任一派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为什么会这样？道使然。何谓道？虽然老子早已说过“道可道，非常道”，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谈谈我的理解。在我看来，所谓道者，指的是自发形成的社会秩序。这种自发形成的秩序也曾被亚当·斯密不无敬畏地称为“看不见的手”。市场上形成的经济秩序是这种自发秩序的典范和坚实基础：每一个进入市场的人都是持自利动机的，他们通过交易达成合作，从而在实现自利动机的同时也造福了他人。从整体社会来看，这种市场秩序提供了一种资源配置机制，它能够最近似地反映出市场参与者的评价的最大化。因此之故，市场机制可能

是人类所能够创造出来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

老子激烈地反对国家干预,他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还说的是,谁去干预,谁就会把事情做坏。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是因为:政府只有首先充分了解每个公民的利益和偏好,并能据此求出社会总体利益,才能胸有成竹地去干预经济;但仅此项准备工作便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因为甚至每个人自己也只能在进入选择过程时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政府是无法获取这些信息的。中国有句古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哉?”,说的是政府为什么不能干预的原因;西方有句谚语:“鸟以为把鱼举在空中是一种善举”,说的是政府强行干预的后果。

退一步讲,即使政府能够无所不知,能够充分体察民情,但在干预措施的执行过程中,也常常会偏离其初衷。因为政府官员有其自身的利益,这种利益和民众的利益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这是因为政府和公民之间在客观上是一种代理人和业主的关系,他们的信息分配本来就是不对称的。考虑到这一点,政府干预的有效性就要大打折扣。

诚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承认市场机制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市场缺陷并不就是政府干预的充分理由,市场做不好的事情并不意味着政府去做就一定做得好。许多人还幻想让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同时登场、双剑联袂,据说这样可以扬长避短。遗憾的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公式在这里却是不成立的,这就好比十字路口的交通岗上不能有两个警察同时指挥,否则司机和行人将会无所适从。从实践上看,政府干预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常常是好心酿成了大错。这正如《道德经》里所说的,“天下多忌讳则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更精彩的是,老子沿着这条思路一直推出:“大道废、有仁义”。我想这是因为既然

道德也是人们自发合作中的产物,那么如果再人为地灌输所谓的“仁义”,不是和人为干预市场经济秩序如出一辙吗?想想我们过去推行的那些“左”得出奇的所谓“共产主义道德”,比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又比如“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再看看今日道德滑坡的现状,不能不让我们去深思这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当我回过头来再读《道德经》时,真有点如梦初醒的味道。

如果仅仅是说到这儿,我觉得还没有触及老子哲学的真义。在我看来,政府干预和自由放任之争无非就是“有为”和“无为”的分歧。老子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他已经超越了这种争吵。常人以为老子思想便是“无为而治”,其实这种概括并不准确。依我看,老子的核心思想应该是“为无为,则无不治”。照这样来看,老子就不是主张政府完全撒手不管,而是反对像“有为”论者主张的那种霸王硬上弓式的行为。老子主张的“为”是要遵循“无为”的原则去做,换言之,要对自然形成的社会秩序保持充分的敬畏。这无疑需要一种更高明的统治手段。

说到政府的作用问题,有关的文献可称得上浩如烟海。我在此只想强调与制度有关的两个方面,即政府在制度深化和制度创新方面的作用。先说制度深化。虽然制度往往是人们自发形成的,但同时也要看到,制度又必须依靠一种外在的、人为的力量加强其效力。康芒斯是制度学派的先驱之一,他把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这个定义虽有欠完备,却正中要害。这是因为,一种制度只有在全体当事人都能严格遵守的前提下,才能充分发挥其效力,但在自发的情况下,这个条件却是无法实现的。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制度不遵守。虽然一种制度能在现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促进人们的合作,它从整体利益上是最优

的,但个人出于个体利益的考虑并不一定遵守它。因为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每个人在消费它时都想做一个“免费搭车客”,比方说,都希望别人是雷锋,自己则不妨自私一些,都谴责别人的假冒伪劣产品,自己的假冒伪劣产品却另当别论。正因为如此,诺斯曾说,如果只接受新古典假设,即仅仅假定每个人都是追求私利最大化的经济人,那么社会将会倒退到一个尔虞我诈、暴力相向的丛林时代。与制度深化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制度不统一。自发形成的制度由于其自身的逻辑以及客观条件的制约,往往只局限于一部分人之间。不同制度背景中的人们在交往时难免产生隔阂和摩擦,从而限制了合作的扩大。由于上述两个原因,使得制度需要外力的强化,政府的作用也无疑在此。具体地讲,我所说的制度深化包括:非正式制度(包括道德、观念、惯例等)的统一;将非正式制度转化为正式制度,如将合同的惯例制定为合同法。正式制度的基本特征便是成文,成文在很大意义上也意味着意见的统一;用奖罚手段加强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执行。从政府的这些任务来看,它必须具有最大的强力手段和权威性。因此,从根本上说,政府的力量是通过威慑表现出来的。《道德经》里说:“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意思是说,如果人们已经不畏惧统治者的威严了,那么最可怕的事情就将到来。由此可见,老子及其追随者们一向是很重视法治的。司马迁作《史记》时将老子和韩非子同列一传,现在的人们虽然会对此觉得不可思议,但在汉朝时,人们对黄老学派的认识确是如此。

接着来看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这一点在《道德经》中并未谈及。我在此主要是介绍诺斯等人的思想作一补充。制度创新过程中的角色有两个,即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其中第一行动集团的任务在于发现制度创新的潜在收益、拟定

创新方案、并说服第二行动集团与之合作。第二行动集团协助实施创新方案,并在创新成功之后与第一行动集团分享收益。在自下而上的改革中,第一行动集团是有关的利益集团,第二行动集团则是作为立法者和执法者的政府。在自上而下的改革中,第一行动集团是中央政府,第二行动集团则是其它组织,比如地方政府,行业公会等,也有可能直接就是民众。在自上而下的改革之中,政府通过宣传来说服人们遵守新制度,或是通过立法执法强制人们遵守新制度。在以下几种情况中,政府适宜于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唱主角:一、政府机构完善而私人市场发育不成熟,这在后进型现代化国家中最为典型;二、潜在收益的获得会受到私人财产权的阻碍,比如环境保护问题;三、潜在收益具有外部性,从而产生“免费搭车现象”,即个人不愿承担制度创新的费用,“三个和尚没水吃”说的就是此种情况;四、制度创新有利于一部分人但却将损害其它人的利益。事实上,凡是较重大的改革,定有政府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与整个社会相比,虽然只是少数人集团,却往往起着扭转乾坤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比社会力量强大是理所当然的。不强大的政府就不是好政府,因为它无法完成其在制度创新过程中的使命,这也正像是“意志薄弱的人不可能真诚”一样。

说完了政府在制度深化和制度创新中的作用,我还想补充一点。诺斯有一句名言:“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考虑到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发展的源泉,这句话实际上说的便是,政府既能通过制度深化和制度创新确立和完善制度,并使之最有效地发挥作用,也是压制和阻碍新制度形成的最大阻力,这时它是制度僵化症的首恶。同时,政府也是使制度沦为为少数人利用的原